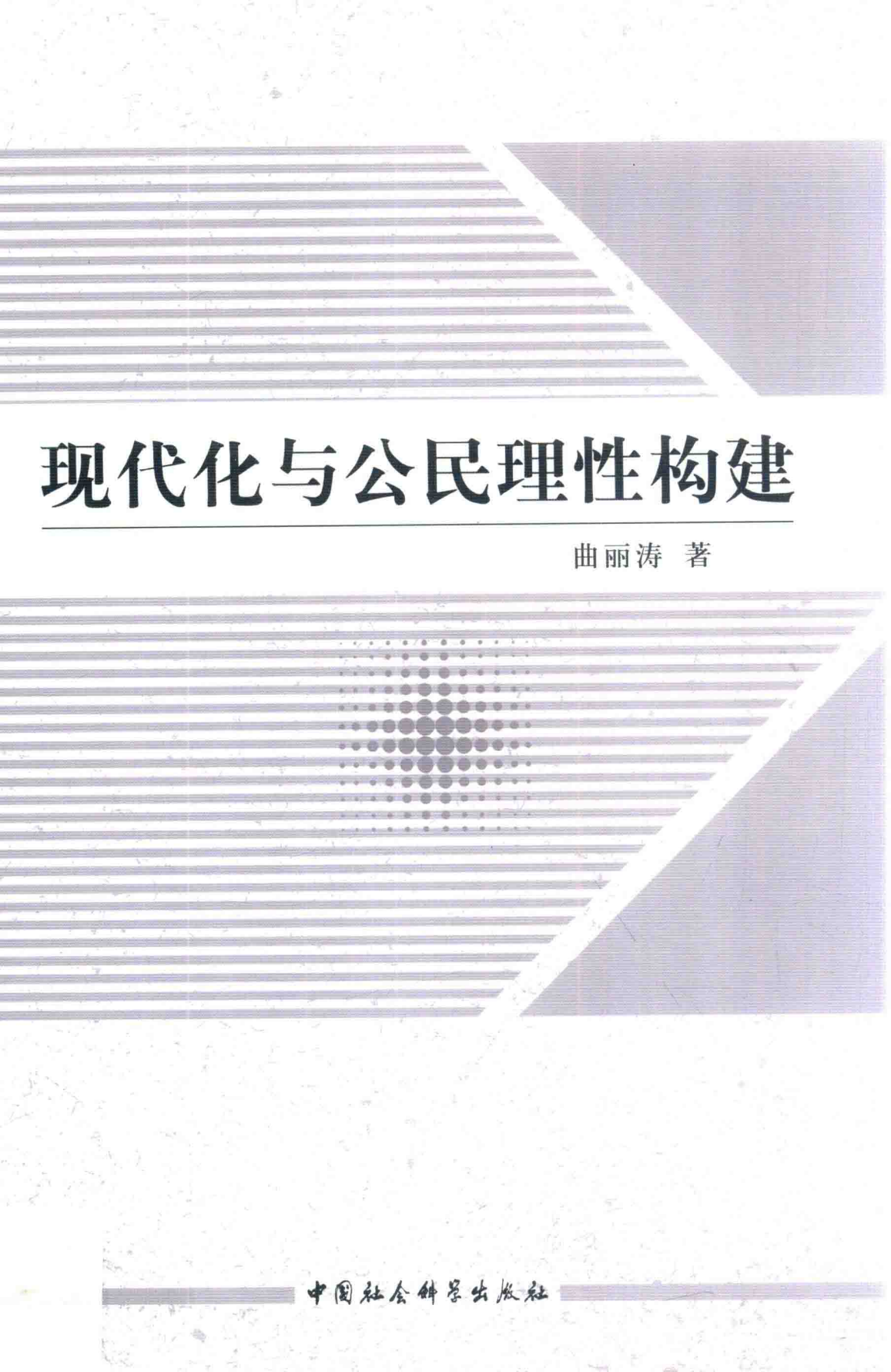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eries of horizontal lines in a light purple or lavender color. A diagonal line, also in this color, splits the cover from the top right to the bottom left. The area to the right of this diagonal line is a solid, slightly darker shade of the same color. In the center of the cover, there is a grid of dots, with the dots in the center being larger and darker, creating a focal point.

现代化与公民理性构建

曲丽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化与公民理性构建

曲丽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与公民理性构建 / 曲丽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203-2396-3

I. ①现… II. ①曲… III. ①公民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517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梁剑琴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 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5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现代化是近百年来中西方社会发展脉络和世界秩序变动的最深刻内涵，而精神层面的变革又是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革。公民理性作为现代社会中基本的精神蕴涵，其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它对我国传统社会政治意识的超越，而且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精神揭示和观念引导上。在政治领域，公民理性既是民主政治确立和发展的思想先导，也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更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在经济领域，公民理性既通过颂扬人的主体性而满足了市场经济对于市场主体独立性的要求，也通过契约精神的彰显而有助于市场经济中契约关系的确立，更通过对社会法治化的引导与推动而保证了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而在文化领域，公民理性则是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使现代人更加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等精神，而且还培养了现代人对于公共价值深刻的体认与关怀。现代社会中公民理性的要义在于它的现代化思维，其侧重于公民在人格上的独立性与平等性，在权利义务上的对等性与统一性以及公共政治参与中的理性和有序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理性就是现代社会成员对于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的自觉反映，其主要体现了公民对于自身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地位、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公共政治参与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观。公民理性以公民主体身份为前提和基础，公民主体身份表达了公民之间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即公民在人格上是独立的，在身份上是平等的，而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则是对等的。公民理性主要反映的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它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存在彼此尊重又相互制约的权责体系。公民理性是以公民的公共政治参与为其基本表征，现代社会中公民角色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每位公民

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过程。从结构内容上来说,公民理性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理性参与意识。公民理性的核心是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角色的意义就在于其对主体性的颂扬,它要实现传统依附性人格的现代性转变,塑造公民的主体性人格,并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是人的主体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权利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现实性肯定,更是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本质体现。而责任义务意识则是权利意识的内在规定,权利本身就包含责任的要素,任何一种行为既要遵循权利法则,同时也要遵循责任法则,从来就不存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主体权利。公民应该尊重他人的权利,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应该对国家民族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心。理性参与意识要求公民对待任何问题要具备理性的思维和能力,在参与的过程中要具有平和、开放、宽容的心态,拒绝非理性的冲动和盲目的行为,做成熟理性的现代公民。

公民理性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产物,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从西方公民理性形成的历史轨迹来看,公民理性的发展有其必要的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从经济机制来说,市场经济引导了公民理性的最初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实现了对传统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超越,它要求社会成员摆脱根植于自然经济中的地缘界限、血缘伦理和等级依附,而以独立和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市场交换体系中。市场主体间的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更是市场经济在法权关系上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构成了个体独立性的现实基础并使个人产生主体的意识,而且市场经济中法权关系意志形态化的结果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凝结。同时作为一种普遍交换的体系,市场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重要标志,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必然导致市场主体之间的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也使个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那种寓于群体内的封闭式生存格局并逐步形成积极参与的意识。从社会机制来说,私人领域构成了公民理性发展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空间,私人领域是以个体独立性为核心,并以独立个体间的自主交往或结合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它与传统社会中带有依附性、等级性和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可以说,正是私人领域的产生才真正实现了人类社

会从“身份”到“契约”的革命性转变。私人领域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与政治国家相分化的要求，并同时确立了与公共政治领域相对立的社会领域，其中包括家庭领域、社会中“需要的体系”以及文化领域。家庭生活作为私人领域的开始，它推动着个体公民理性的最初启蒙，社会中“需要的体系”作为私人领域的核心，它使公民理性获得了形式化的普及，文化领域作为私人领域的最高层次，它则实现了公民理性的实质性升华。从政治机制来说，现代民主政治是公民理性发展的制度保障。现代民主政治对于传统政治体系的颠覆是私人领域发展的结果，私人领域产生最大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其真正实现了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分化，并在两者互动与博弈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业化、政治权威的理性化与合法化、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政治运作的制度化与法治化以及政治参与的理性化与有序化。对于公民理性的发展来说，现代民主政治既为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着健全的制度保障，也通过民主制度的教育功能而塑造着良好的公民性格，更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实践机会。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公民理性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传统封建社会下，个体独立性明显先天不足，漫长的专制制度、悠久的小农经济以及严格的宗法族制塑造了古代社会民众根深蒂固的臣民思维，个人缺乏政治主体的内在自觉。在近代文化启蒙的过程中，由于先天缺乏现代性文化植根的土壤以及中西方政治文化内在价值系统的巨大差异，从西方引进的思想观念很难深入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当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接受有关平等、自由、权利、责任等观念时，主要是接受了这些观念的表层含义，而忽略了这些观念背后的内在价值准则和理论根源。而且在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解放和主体内在的自觉也在救亡图存和振兴民族的浪潮冲击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解而暗含局限性。之后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大力改革，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政治领域越来越民主化，文化领域也日益多元化，公民理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部分民众不仅能认识到自身的权利和责任，而且对待问题的理性判断能力也不断提高，并懂得通过有序的参与来反映和维护自身权益。然而，由于受到某些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有些公民的理

性思维和能力还有待提升，尤其是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民众还存在盲目的从众、情感的冲动、非理性思维以及不理智的行为，这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并给他人、社会和国家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当前公民理性建构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公民理性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只有通过个人、社会和国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具体而言，公民理性的发展既需要公民个人的自发启蒙，也需要国家有针对性地培养与引导，更需要社会整体氛围的熏陶与感染。公民理性发展的模式既需要借鉴西方那种自发生成模式，同样也需要有计划的建构生成模式。私人领域可以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根基，公民教育可以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系统化的培养和训练，政治社会化可以为公民理性的普及与传播提供多样化的形式和渠道，有序的政治参与则可以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实践。可以说，公民理性的发展必将是多种力量、不同模式以及多元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曲丽涛

2018年1月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的意义	(2)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	(4)
一 国外研究现状	(4)
二 国内研究现状	(7)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重点	(8)
一 研究的思路	(8)
二 研究的方法	(9)
三 研究的重点	(10)
第一章 公民理性概述	(11)
第一节 公民理性的历史发展	(11)
一 古希腊时期	(11)
二 古罗马时期	(14)
三 西欧中世纪时期	(17)
四 近代时期	(18)
五 现代时期	(29)
第二节 公民理性的内涵	(31)
一 公民及相关概念	(31)
二 公民理性的界定	(35)
第三节 公民理性的内容	(38)
一 公民理性的结构界说	(38)

二 公民理性的结构内容	(39)
第二章 公民理性发展的经济性机制	(48)
第一节 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经济形态的演变	(48)
一 传统自然经济形态	(49)
二 现代市场经济形态	(52)
第二节 市场经济引导公民理性发展	(55)
一 市场经济的主体性要求引发个人的主体意识	(56)
二 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中法权关系的凝结	(57)
三 市场经济中的契约式连接必然要求责任的约束	(59)
四 市场经济中的普遍交换体系引导个体参与意识	(60)
第三章 公民理性发展的社会性机制	(62)
第一节 从传统共同体社会到现代私人领域：社会形态的 变迁	(62)
一 自然经济的确立与共同体社会的形成	(62)
二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私人领域产生的逻辑	(66)
三 由共同体社会到私人领域：身份到契约的演进	(69)
第二节 私人领域的演变	(72)
一 黑格尔：相互需要的体系	(73)
二 马克思：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	(74)
三 葛兰西：文化意义和功能	(75)
四 哈贝马斯：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	(76)
第三节 私人领域的三个层级与公民理性的发展	(78)
一 家庭领域的最初启蒙	(79)
二 市场经济的形式化普及	(81)
三 文化领域的实质性升华	(83)
第四章 公民理性发展的政治性机制	(87)
第一节 共同体催生下的传统政治	(87)
一 国家统合体制	(87)
二 宗法伦理文化	(88)
三 个人依赖国家	(88)

第二节 私人领域孕育下的现代民主政治	(89)
一 政治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	(90)
二 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和合法化	(91)
三 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91)
四 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92)
五 公民参与的普遍化和有序化	(93)
第三节 民主制度对公民理性发展所发挥的三重功能	(94)
一 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95)
二 提供文化教育的功能	(95)
三 提供政治实践的训练	(96)
第五章 我国公民理性的发展	(98)
第一节 公民理性发展的历程	(98)
一 传统社会公民理性的不足	(98)
二 近代社会公民理性的启蒙	(107)
三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公民理性的不断提升	(108)
第二节 公民理性发展的意义	(109)
一 公民理性与政治民主化	(112)
二 公民理性与经济市场化	(115)
三 公民理性与人的现代化	(117)
第六章 当代中国公民理性的构建	(119)
第一节 重视公民教育	(119)
一 公民理性的发展得益于公民教育的培养和塑造	(119)
二 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	(121)
三 公民教育理念的转变以及公民教育体系的建构	(122)
四 发达国家公民教育的启示	(124)
第二节 推进政治社会化	(129)
一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塑自身的重要手段	(129)
二 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公民理性发展的形式	(131)
三 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阶段性与公民理性发展规律的内在 契合	(133)

四	政治社会化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渠道	(135)
五	政治社会化引导公民理性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136)
第三节	实现有序参与	(137)
一	公共参与是公民践行公民角色的重要形式	(140)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公民参与模式的转换	(142)
三	当前公民参与模式的分析	(143)
四	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制度	(144)
第四节	完善社会公共领域	(145)
一	社会公共领域发展的历史	(148)
二	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	(152)
三	社会公共领域与国家关系的理论透视	(154)
四	我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	(158)
五	社会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关系	(160)
六	推进社会公共领域发展的对策	(168)
参考文献		(173)
后记		(192)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进程是我国当前社会中最深刻、最复杂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始于物质层面的变革，进而引发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其中精神层面的变革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深层次的变革。现代化进程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整体变迁过程，它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形式、政治体制架构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上，其更体现为人们文化心理的现代化变迁。现代化过程必然需要现代人来主宰，人的因素也就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发达或落后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外在的器物和制度，而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伴随着我国近代现代化的起步，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早已开始，甚至到今天这一自我认识之路也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处于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过程中，新文化价值体系的架构和整合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们的文化心理还徘徊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和融合中，传统文化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文化变迁滞后而导致的现代文化缺位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和挑战，寻找新文化价值体系的支撑点并实现传统文化的蜕变和更新是我国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对于公民理性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

公民理性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意识，它是现代社会中基本的精神，其

对于传统臣民意识的否定和超越是我国当前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从根源上来说,公民理性最初是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产物,它在西方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文化借取是任何一种文化丰富和完善自己的重要途径,公民理性注定需要融合西方政治文化的优质资源来建构。而同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实现文化变迁,这就意味着我国公民理性的发育必须要建立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经历中西方政治文化融合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将会面临一定的冲击,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自然淘汰过程,只要我们能真正把握文化之间融合与变迁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就没有必要悲观和恐惧。正如胡适在其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华传统及其将来》中所说的那样,对这些文化方面的伤亡,我们不必难过,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为中国从它孤立的文明枷锁中得到解放,新文化成分的接受,正可以使旧文化内容丰饶,增加活力,我们永远不畏惧中国文明于大量废弃本身事物及大量接受外国事物后,会发生变体或趋于消灭的危险。我国公民理性的建构应该是在理性地借取并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优质资源以及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基础上的“文化重整”。这种“文化重整”其实就是有选择地实现中西方文化特质的互补与融合,并反省和再造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我们现在已经自愿不自愿地步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现代化的范畴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我们不能回避,而只能通过做好这项“文化重整”的系统工程来培育我国的公民理性,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最后定会成功。正如罗素在《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所说,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

二 研究的意义

(一) 研究的理论意义

应该说当前学界对公民理性分散性的研究较多而系统性的研究较少,本书力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系统化研究。针对当前公民理性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首先要厘清公民理性独特的内涵。公民

理性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它的政治要义上,其侧重于公民在人格上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在权利义务上的对等性和统一性以及公共参与中的理性和有序性,它是公民对于自身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地位、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公共政治参与的感受、认知和评价。这就将公民理性的内涵定位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中,从而使我们对公民理性的分析和理解真正回归到其本身的政治要义中。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公民理性有其生成和发育的规律,而学界对此研究略显薄弱。公民理性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一种社会意识,其生成和发育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本书通过追溯公民理性形成的历史轨迹而考察了公民理性发育的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弥补学界对于公民理性形成机制研究的不足。而对于我国公民理性发育问题的研究,则重点分析了当前制约我国公民理性发育的诸多原因,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社会结构因素四个方面,多元视角下的分析将会使我们更加明晰我国公民理性发育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而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我们才能做出培育我国公民理性的理性选择。应当说,我国当前公民理性培育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为重国家轻社会、重现代轻传统、重教育轻实践。公民理性的培育其实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它需要个人、社会、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我们既需要提供公民理性成长的宏观环境,也需要研究公民政治心理的变迁规律;既要注重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的优质资源,也要重视反思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既要强调公民教育的培养,也要重视公民政治参与实践中的体验以及政治社会过程中多种渠道的普及和传播。对于公民理性培育路径系统化的分析不仅给我国公民理性的培育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而且还充实并深化了对公民理性问题的相关研究。

(二) 研究的现实意义

对于公民理性发育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更是基于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公民理性是现代社会成员对于公民身份及其价值的自觉反映,其内容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理性参与意识。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公民理性是对传统臣民意识的否定和超越,它不仅表征着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变迁的重要内涵,而且还推

动着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公民理性完全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主体性经济,它以经济主体的相互独立和自主选择为前提,而公民理性主要体现为公民主体意识,通过对公民独立人格的颂扬来确立公民的主体性,从而符合市场经济对于经济主体独立性的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契约式经济,它是通过契约的形式来确立经济关系并配置资源,契约是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彼此之间权利和责任的强制性约束。而公民理性中对于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强调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契约的连接,这将有助于市场经济中契约关系的确立。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公民理性则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结构,它是民主政治确立和运行的心理基础。作为民主政治的隐形内核,公民理性是民主制度的理念内化于公民的政治心理而形成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它既在民主政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观念启蒙作用,也以其本身所特有的稳定性特质而有效平衡政治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能通过对公民政治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以及为政治体系提供必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支持而保证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在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公民理性在人的观念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现代社会要求个人必须具备独立、开放、理性、参与等意识,而公民理性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意识,它高扬公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强调基于权利和责任相对等的理性认知,更崇尚对于公共利益或价值的参与和维护,公民理性本身就是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公民理性在人类社会的横向坐标体系中属于文化的范畴,而在文化体系内部则主要属于政治文化的概念。最早对文化进行界定的学者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他于1871年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首次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泰勒对于文化的描述性界定不仅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

使文化成为一个复合性的整体概念。后来的学者就沿着泰勒所开创的这一方向继续对文化进行归纳和总结。当代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在其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曾经罗列了文化的 164 种定义，这些定义从哲学、艺术、教育、心理、历史等不同视角去探讨文化的内涵。在他看来，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各种业已模式化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一种文化就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样式。他最后在其著作《文化与个人》中对文化做了如下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也包含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克拉克洪对文化的分析指出了文化的显性和隐性内涵。另一位人类学家，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社会生活有其地域性，在特定的交往形式中产生独特的规则和习惯，文化有其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它是人类活动的组织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来自人类的某种需要，人类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永久地聚集并产生一套特有的规律和技术。在这里，马林诺夫斯基把社会制度看作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以后的文化研究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些先前学者所开创的文化框架下，只是更加具体地归纳出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中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则仅仅把文化限定为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社会观念形态。

政治文化是人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的文化内涵。按照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制度的内在价值依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有过一些相关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同某些目的相符的性格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拥护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须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18 世纪英国政治学家伯克认为，构成社会的关系整体最终依赖于组成整个整体的个人

的习惯性反应。习惯要比那些规则或道德信条更可靠。美国政治思想家杰斐逊在论述美国民主制度时也曾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仅能治标而不能解决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民主素质，每一个政府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都有腐化的可能，只有公民素质的提高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从根本上防止政府的蜕化、变质，防止民主转化为暴政。19世纪法国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时也明确指出，地理位置、法制和民情这三大因素都对美国民主制度有所贡献，但是，若要按重要程度来说，则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则不如民情。政治文化除了受早期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影响之外，还受到各个社会学科学术研究的推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层次理论、人格结构理论、性本能理论、释梦理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深入探究了人类心理的变迁规律；本尼迪克特以整体文化为研究对象来对不同地域群体的行为模式和主观取向做系统的解释和预测；韦伯剖析了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演变的关系，提出宗教和价值观对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也注意到了系统结构背后的角色并进行分析，指出应该引导角色行为模式的思维取向、感情和价值标准。

从严格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兴起的。而后在以上学术潮流的推动下以及伴随国际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政治文化作为新的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于政治学的舞台上。1956年8月，美国政治学家G. A. 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学体系》一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开拓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并形成一股学术潮流。G. A. 阿尔蒙德最早提出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个特定的行为模式就是这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每个政治体系中个人对政治的取向模式构成了他们政治行为的基础，并使政治活动富有意义。他认为公民理性应分为十个主要方面：“第一，个人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的认知；第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态度；第三，个人的党派信仰；第四，公民责任感；第五，公民能力感；第六，臣民能力感；第七，公民能力感和政治参与、政治忠诚的关系；第八，社会态度与公民合作的关系；第九，社会组织与公民能力的关系；第十，政治社会化与公民能力的关系。”